

桐鄉朱毓魁編輯

第四冊

國語文類選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九年四月印刷
民國九年四月發行
民國九年八月再版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梧州新州貴陽桂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莞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九江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香港

選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中華書局

局

局

局

局

魁

冊

元

號

三號

CHONGKING

●新文化叢書徵稿啟事

新文化運動的呼聲一天高一天廣一天關於時代思潮的作品散見於各種新雜誌的不少但都是零零碎碎不成片段當我們『飢不擇食』的時候還可以勉強過去要真正滿足我們『求知』的欲望實在還嫌不夠所以現在出版界的趨勢已由雜誌時期一變而入於叢書時期了

我們這個新文化叢書就是以應這個需要為目的但我們知識有限所以要向外間徵稿我們所擬定叢書的形式和內容有以下兩種辦法

(一)關於形式的 分大中小三種大叢書字數約二十萬左右中叢書約十萬左右小叢書約五萬左右(如果有一二三萬字的稿子也歡迎但報酬遞減)

(二)關於內容的 無論『文學』『哲學』『科學』『通論』『世界大勢』『社會問題』等等都一律歡迎文言白話也不加限制

收稿的方法我們也擬定了下面三點

(一)小叢書的版權我們希望著作者一次讓與本局每本報酬五十元特別者可至一百元

(二)中叢書和大叢書的辦法或由著作者保留版權或照小叢書辦理均可關於報酬臨時議定

(三)版權已讓與本局的稿件即用新文化叢書的名目各學術團體保留版權的稿件即用某學術團體叢書的名目(如某某學會叢書或某某學社叢書之類)

關於裝訂的形式凡以版權讓與本局的由本局定凡保留版權的由著作者或學術團體自由選擇

關於校對的事我們完全負責特別精細

稿件請掛號寄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中華書局編輯所由東西文譯的并請將原本寄下合用即以酬金奉上不合仍掛號寄還郵費由本局擔任

關於徵稿的話說完了但有一種意思還要聲明我們見得現在出叢書有『三方面都要顧到』其一為著作者的報酬不能過高也不能太菲但程度愈高勢力愈大的書愈要求著作者犧牲因為銷路不多書局的犧牲很大的 其二為讀者的購買力只求普及定價不能太大 其三為書局營業祇求不受損失決不忘記為文化運動盡力這是我們一定的趨向希望國內外著作家與以一種同情

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編輯部謹啟 九年三月一日

國語文類選

第八類 政法

實行民治的基礎

陳獨秀

地方自治

與

同業聯合

兩種小組織

民治是什麼？難道就是北京民治日報所說的民治杜威博士勞民治主義的原素爲四種：

(一) 政治的民治主義 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類。

(二) 民權的民治主義 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

(三) 社會的民治主義 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第八類 政法 實行民治的基礎

(四) 生計的民治主義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翻平貧富的階級之類。

前二種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民治主義，後二種是關於社會經濟方面的民治主義。原來「民治主義」(Democracy)歐洲古代單是用做「自由民」(對奴隸而言)參與政治的意思，和「專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後來人智日漸進步，民治主義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但拿他來反對專制帝王，無論政治，社會，道德，經濟，文學，思想，凡是反對專制的特權的，遍人間一切生活，幾乎沒有一處不堅起民治主義的旗幟。所以杜威博士列舉民治主義的原素，不限於政治一方面。

我們現在所盼望的實行民治，自然也不限於政治一方面。而且我個人的意思，覺得「社會生活向上」是我們的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的各種工具；政

治雖是重要的工具，總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說若要改良政治，別忘了政治是一種工具，別拿工具當目的，才可以改良出來適合我們目的的工具；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閒文。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舉的四種原素，把政治和社會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義，當做達到我們目的——社會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

在這兩種工具當中，又是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我以為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應當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基礎。

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至於他關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覺得還有點不徹底；我們既然是個「自由民」不是奴隸，言論出版信仰居住集會這幾種自由權，不用說都是生活必須品；憲法我

們也是要，代議制也不能盡廢；但是單靠「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恐怕我們生活必須的幾種自由權，還是握在人家手裏，不算歸我們所有。我們政治的民治主義的解釋，是由人民直接議定憲法，用憲法規定權限，用代表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實說，就是消極的不要被動的官治，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們中國社會經濟的民治，自然還沒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華民國的假招牌雖然掛了八年，却仍然賣的是中華帝國的藥，中華官國的藥，并且是中華匪國的藥，「政治的民治主義」這七個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還不大順眼。但是我決不因此灰心短氣，因為有三個緣故：一是中國創造共和的歲月，比起歐美亦還是太淺，陳年老病那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國社會史上的現象，真算得與衆不同，上面是極專制的政府，下面是極放任的人民，除了

訴訟和納稅以外，政府和人民幾乎不生關係；這種極放任不和政府生關係的人民，自己却有種種類乎自治團體的聯合；鄉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團練，鄰會有會館，有各種善堂（育嬰，養老，施診，施藥，積穀，救火之類），有義學，有各種工商業的公所；像這些各種聯合，雖然和我們理想的自治隔得遠遠，却不能說中國人的自治制度，沒有歷史上的基礎。三是中國人工商業不進化和國家觀念不發達，從壞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因此物質文明不進步，因此國民沒有一致團結力；從好的方面說起來，我們却因此沒有造成像歐洲那樣的資產階級和軍國主義，而且自古以來，就有許行的「並耕」，孔子的「均無貧」，種種高遠理想；「限田」的討論，是我們歷史上很熱鬧的問題；「自食其力」，是無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證明我們的國民性裏面，確實含着許多社會經濟的自治主義的成分。我因為有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自治主義和社會經濟的自治主義，將來都可以在中國大大的發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氣，所以我不抱悲觀。

第八類 政法 實行自治的基礎

現在政象不佳，沒有實行自治主義的緣故，也有好幾層：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們從前把建設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傳自治主義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軍全由軍人主動，一般國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擁護共和的進步國民兩黨人，都不懂得自治主義的真相，都以為政府萬能，把全副精神用在憲法問題，國會問題，內閣問題，省制問題，全國的水利交通問題，至於自治的基礎——人民的自治與聯合——反來無人過問；五是少數提倡地方自治的人，雖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舊迷信大規模的省自治和縣自治，其實這種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的分治，是畫分行政區域和地方長官權限的問題，仍舊是官治，和自治的真正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截然然是兩件事。我們現在要實行自治主義，首先要注重自治的堅實基礎，必須把上面說的二、三、四、五這幾層毛病通同除去，多幹實事，少出風頭，把大偉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運動家大愛國者的架子收將起來，低下頭在那小規模的

極不威風的堅實的民治基礎——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上做工夫；不然，無論北洋軍人執政也罷，西南軍人執政也罷，交通系得勢也罷，北方的安福部得勢也罷，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學會）得勢也罷，進步黨的內閣也罷，國民黨的內閣也罷，舊官僚的內閣也罷，我可以斷定中國的民治，仍舊是北京民治日報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講的「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的民治。我不是說不要憲法，不要國會，不要好內閣，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國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對省自治，縣自治；我以為這些事業，必須建築在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充分發展；大規模的民治制度，必須建築在小組織的民治的基礎上面，才會實現；基礎不堅固的建築，像耶沙上層樓，自然容易崩壞；沒有堅固基礎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裝飾得如何堂皇，實質上畢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決不會實現，各種事業也不會充分發展。社會經濟的民治主義，那一國都還沒有實行；政治的民治主義，英美兩國比較其餘的國家，總算是發達的了。他們所

以發達的由來，乃是經許多歲月，由許多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團體和各種同業聯合，合攏起來，才能够發揮今天這樣大規模的民治主義；好像一個生物體，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塊整物，乃無數細胞組織，器官組織，合攏起來，才能够成就全體的作用。他們的民治主義，不是由中央政府頒布一部憲法幾條法令，就會馬上湧現出來的，乃是他們全體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中說道：「美國是一個聯邦的國家，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便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說道：「美國的聯邦是由那些有獨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併起來的，歷史上的進化是由一村一村聯合起來的。美國的百姓是為找自由而來的，所以他們當初祇要自治，不要國家，後來因有國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聯邦。」

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

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應當在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這基礎是什麼？就是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這種聯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間接的；是要實際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務，不是掛起招牌就算完事。這種聯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組織。

現在有許多人的心理，以為時局如此紛亂，政府那裏顧得到地方自治的問題；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還未經正式國會詳細規定出來，我們怎樣着手？至於同業聯合的組織，法政府國會都還未曾想到，更是無從組織。我想這種見解是大錯而特錯，是有兩個根本上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以為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實現。我以為這種從上面提倡的自治聯合，就是能够實現，也只是被動的官式的假民治，我們不要；我們所要的，是從底下創造發達起來的人民自動的真民治。第二個錯誤，是以為法律能

够產生事實，事實不能够產生法律。我的見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對。我以為法律產生事實的力量小，事實產生法律的力量大。社會上先有一種已成的事實，政府承認他的「當然」就是法律，學者說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學說。一切法律和學說，大概都從已成的事實產生出來的。譬如英美兩國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們的人民創造出來這種事實，後來才由政府編成法典，學者演成學說，并不是先由政府頒布法典，學者創出學說，他們人民才去照辦的。所以我覺得時局紛亂不紛亂，政府提倡不提倡，國會有沒有議決法案，都和我們人民組織地方自治同業聯合不生關係。

我所說的同業聯合，和那由店東組織的各業公所及歐洲古時同業協會（Guild）不同，和歐洲此時由工人組織的職工聯合（舊譯工聯 Trade Union）及其他各種勞動組合也不同。因為此時中國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漢口幾個大工廠和各處鐵路礦山的督辦總辦，都是關老官，當然不能和職工們平起平坐，其餘一般商界的店東店員，工界的

老板夥計，地位都相差不遠，純粹資本作用和勞力沒有發生顯然的衝突以前，凡是親身從事業務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聯合。關於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種種的學說，制度，非常之多；至於詳細的辦法，一時更說不盡；我現在單只就中國社會狀態的需要而且可以實行的，舉出幾條原則，免得失了直接的實際的精神，就會發生籠統，渙散，空洞，利用，盤據，腐敗，種種不可救藥的老毛病。

最小範圍的組織 鄉間的地方自治，從一村一鎮著手，不可急急去辦那一鄉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馬路或是警察的分區，分做許多小自治區域，先從這小區域着手，不可急急去辦那城自治市自治。同業聯合是要拿一個地方的一種職業做範圍，譬如一個碼頭的水手，船戶，搬運夫，一個礦山的礦夫，一條鐵路的職工，一個城市的學校教職員，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木匠，瓦匠，車夫，轎夫，鐵工，紡織工，漆工，裁縫，剃頭匠，排印工人，郵差，脚夫，等，各辦各的同業聯合；商業的店東管事和店員，在小城市裏便歸在一個

聯合，在大城市裏，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業或馬路分辦各的同業聯合；萬萬不可急於組織那籠統空洞的什麼「工會」，「廣大無邊的什麼」，「上海商界聯合會」，什麼「全國工人聯合會」。凡是籠統空洞沒有小組織做基礎的大組織，等於沒有組織；這種沒有組織的大組織，消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多數人冷淡，渙散，放棄責任；積極方面的惡結果，就是造成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

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 這種小組織的地方團體和同業團體，人數都必然不多，團體內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會直接議決事務，無須採用代表制度。若是一團體的事務，各個分子都有直接參與的權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極方面，可以免得少數人利用，把持，腐敗；在積極方面，可以養成多數人的組織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業上盡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觀團體渙散。中國現在的地方自治辦不好，就是因為大家讓少數的紳董盤踞在那裏作惡；同業聯合沒有好效果，就是因為現在各業

公所的組織，只是店東管事獨霸的機關，與多數的職工店員無涉，所以我主張小組組織，就是因為小組組織的人少，便於全體直接參與，一掃從前紳董店東工頭少數人把持的積弊，又可以磨練多數人辦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數的教育程度不夠，還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國之民治的發展」講演上的話來回答：『民治主義何以好呢？因為他自身就是一種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過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會發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對於政治有很大的責任，然後自然能養成一種政治人才。美國的浩雷斯曼說：「我們的主張不是說人生下來就配干預政治，不過總要叫他配干預才是。」這就是民治主義的教育。從前美國的選舉也有財產教育男女的限制，現在才把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後，從沒聽人說過那個人不會選舉，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學得的，不是生來的。』若有人疑心女子

第八類 政法 實行民治的基礎

不便加入，我以為男女應該有同等權利的理論，姑且不提，單就事實上說，女子加入的壞處，我一時想不出；我却想出許多女子加入的好處，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於同情心等，可以使團體凝結的性質，都比男子好；他們第一美點，就是不利利用團體去貪緣官做。

執行董事不宜專權久任，執行團體議決事務的董事，由團體全員投票選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不應當有教育財產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數宜多，任期宜短，不能連任；每半年改選三分之一，滿期退任的次第，抽籤預定。無論大會或是董事會，都只設臨時主席，取合議制，不設會長總董。這都是防備少數人盤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團體自身生活的實際需要，地方自治應該注重的，是教育（小學校及閱書報社）、選舉（國會省縣議會及城鄉自治會）、道路、公共衛生、鄉村的地方，加上積穀、水利、客蟲、三件事。同業聯合應該注重的是：教育（補習夜學、閱書報社、通俗講演）、儲蓄、公共衛生、相互救濟（疾病、老死、失

業等事。消費公社、職業介紹、公共娛樂、勞工待遇等事，上海工業界現在有許多同業的聯合會發生，我們十分歡迎。但是我們也有十分擔心的兩個疑問：（一）是否僅僅爲了外交的接觸，還是另有團體本身生活上實際需要的覺悟？（二）是否店東管事們在那裏包辦上海各馬路的商界聯合會，頗和我主張的小組織相同，但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一）到會的會員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全是全體，並沒有過半數。（二）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東管事，沒有店員的分。（三）本身的組織和實際生活需要的問題，都沒有談起，請了許多事外的人來演說，發些救國裕商的空套議論，這是做什麼？我盼望社會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爲我所注重的實際生活需要討價過低，說我主張不徹底。我相信照中國現社會的狀況，只有這種小組織，注重這種實際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義堅實的基礎，乃是政治經濟徹底改造必經的門路。我盼望官場中神經過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馬上就聯想到破壞統一，不要提起同業

聯合，馬上就聯想到社會革命。我主張的這種小組織，實在平易可行，實在是共和國家政治經濟的實際需要，實在說不上什麼破壞統一，什麼社會革命。這種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們政權無涉，於你們官與多礙，就是這種小組織的同業聯合，所注重的實際需要，也都是現在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并非什麼過激的辦法，不但比不上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那樣徹底，就是比英國的工聯（Trade Union）還要和平簡陋得多。

斷絕軍人官僚政客的關係，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國的三害，無論北洋軍人、西南軍人、老官僚、新官僚、舊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已未系，政學會可以總批他「明搶暗奪誤國殃民」八個大字，一定要說那個好那個歹，都是一偏之見，缺少閱歷。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衝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基礎上最後

要留意的，就是別讓三害鬼混進來，伸出他背上的那隻骯髒的黑手，把我們的一線光明遮住了。蠅營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慣會看風頭，乘機竊取起來，更是眼明腿快，我們要格外嚴防，別讓他利用我們潔白的勞動工人和青年學生，來辦什麼政黨什麼勞動黨，做他當總長的敲門磚；最好是各種小組織的事務所，都貼上「小心扒手」，好叫大眾留神。我所以主張小組織，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堅實的基礎，也是故意擺出矮戶低簷的景象，好叫這班闊人恐怕碰壞了紗帽翅，不來光顧才好。（新青年）

我們政治的生命

陶履恭

我們中國由君主改爲共和已經七年了。這七年裏頭紛紜擾攘，變故迭生，四萬萬人沒有過一天安靜的日子。大凡人遇見了困苦的事情，或是使身體受苦，或是使精神不快，就是受了一種刺激，總要生一種感想。那感想是總不外乎要脫解所受的苦痛。中國一般的人民在這七年裏頭已經鬧得個民不聊生，在戰事區域內的，更是流離失所，家敗人亡；

每天生的活，一天難似一天，租稅加重，物價加貴，收入日少，鈔票日跌。他們對於這種苦況，也自然有一番感想的了。一派的人想這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沒有什麼研究討論的價值。生活既然是這樣的艱難，我們只有爲自己的生的計畫罷了。普通的人只求飽食煖衣，野心高的人更還希望着安富尊榮。生物的特性本來就是求生的意志，人類求生的意志本來又是他最強的本能，所以無論是撞見了什麼境遇，無論是碰上了什麼狀況，總是求生。人類貪生怕死，本也無足怪的。讀者諸君試把眼放開看一看那懂懂往來的男女老少，那求生之念够怎麼樣的迫切呀！那沿街叫化的乞丐，呼爺叫娘，受人唾罵，所求的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銅元半碗稀粥爲着保全性命罷了。那倚門賣笑的娼婦，迎新送舊，供人玩弄，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吃三頓飽飯穿兩件新衣，將來求做個閹員政客的寵妾罷了。那焚殺擄掠的軍匪，傷天害理，屠戮無辜，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搶些衣服財寶，供他們自己的揮霍罷了。那結納權貴的政客，趨炎附

勢，無隙不乘，爲的是什麼呢？不過圖個高樓大廈左姬右妾罷了。就像這四種人，雖然不是操一種的職業——假使乞丐、娼妓、軍匪、和政客，可以算做職業——但是那求生的目的却都是一樣的。一個人生在某個家庭裏，是一樁偶然的事；甲生在貧民的家裏，爲求生的意志所驅使，就去做乞丐；乙生在縉紳的家裏，爲求富貴的生命，就去做軍匪，做政客。倘若兩個人換個境遇，那求生的方法又自然不同，但是那求生的目的仍然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人類只求生存，也不問求生的方法是怎麼樣，也不問所求的生存是什麼狀態，據我想是大錯的。

年紀在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民，在前朝的時候，景況比現在好的，另外有一種感想。他們覺得現在生活的困難，就聯想到十年前所過的好日子。想到以先所過的好日子，也就厭惡現在政府無能的狀態，想望前朝的盛況。所以有一派的人想望康熙乾隆爺的盛代，就說定還是帝國時代比現在民國好。因爲清朝雖然是異族秉政，但是比現在軍閥政

府元老政府還勝過多多。以先的政權沒有這樣的不穩，以先的軍人沒有這樣的跋扈，以先的金融沒有這樣的難亂，以先的風氣沒有這樣的卑鄙，以先的生活沒有這樣的困難。總之，以先的人民都能享安樂的幸福。我想這是一個誤謬的見解。發這個議論的人，沒有趕上那康乾的盛代，所以不能知道康乾時代的真相。中國的歷史沒有一部是描寫人民的歷史，沒有一部是寫真社會的歷史。卽有清三百年，的歷史，也還要等著一位大歷史家，徵集無限真確的材料，運用他特出的心思和想像力纔可以把人民社會的真相描寫出來呢。這都是因爲失望於現在，所以就追想到過去。所以那迷信古典沒有辯證的能力的書獃子，更追念那太古堯舜禹湯治世之世，以爲是黃金時代咧。因爲失望於現在，就託思於既往，是我們人類常有的心理。但是既往是萬萬追不回來的，又何必去想念他呢？況且那帝政時代的秕政弊端，實在不見得少，小民所受的苦痛實在也是狠利害，不過因爲是在過去所以就忘了，俗語所謂「好了瘡，忘了

痛」正是此意。現在又遇見苦惱，所以就已把已經好了的創痛忘了。我們要想避去現在的苦痛，只追念既往是不濟事的。

這七年的民國，會造出這許多委曲求生的人民來，有一派人說是政治上的罪惡。這幾年的政治不良，荼毒小民，是人人都知道的。政治舞台上的脚色，總是不外乎那幾個：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賣國奴，留學生，和前清的猾吏。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一人兼戴着幾種頭銜的，一個一個的都登過場，個人獨唱全體合唱的戲已經由他們都演完了。假使請他們再演一番，仍然還是舊套頭，翻來覆去，又有什麼意思。倘然老脚色漸漸的下台，一班新脚色再上台，所演的恐怕還及不上他們的老前輩呢。所以政治的罪惡既然已經鑄成，使人民流離困苦，喪家亡身，那是已往的不可收拾的了。但是一般的人民現在還在那裏熱心的希望那造罪惡的去除他們的罪惡，去解人民的倒懸。豈不是妄想麼？這不是推理上所謂連環推論 Vicious circle 永遠出不

去環外麼？我想我們人民受苦不都是政治上的罪惡，不都是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猾吏，留學生，賣國奴的罪惡，實在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罪惡。美國林肯說過的，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應該有什麼樣的政府。

詳細研究起來，我們中國人對於時局，對於自身，各人有各人的感想，不必全相同的。但是上邊所說那三種的看法，可以說是代表國人大部分的意思。一派的人，兩隻眼睛只望着背後，却看不見前面。發起議論來，總是前代如何，古代如何，不推想現在應該如何，可以如何。一派的人只在那裏責罵當局，却忘記了自己。發起議論來，總是軍人如何，政府如何，不推想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又一派的人抱着那自私的齷齪的實利主義，只謀自己的富貴利達，却忘記自己以外的幾萬萬的男女。發起議論來，總是我應該如何，別叫他們如何，不推想我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這三種觀念都不是健全的，都是片面不見全體的見解，都是戕賊社會不是進善社會的辦法。就是那已經達到富貴的，果然得到實利

了麼？我也不能無疑。我想那專營私利己的，所得的也不過是肉慾的物質的實利，損害人生的價值。他們的行為是釀造社會的罪惡，貽害他們的子孫。那禍患及於社會是無窮盡，怎麼會認做實利呢？

現在我們要覺悟上邊所說的三種態度都不是健全的態度。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專制；我們受政治的擾亂不能有良善穩靜的生命的緣故，正是受專制的毒害。要知道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政，誠心按着民治的道理行去，纔是救濟我們自己惟一的方法。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要有歷史的觀念。世上的事都是相繼續的，絕沒有與以前隔斷再重完全新發生的。所以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也是歷史的產物，因襲固有的制度。因為是因襲固有的制度，所以就是與民主主義相背馳。現在革除那固有的制度的壞的，實踐民主主義，就是解救我們人民的根本條件了。

何以說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呢？這個道理說起來很

長，現今只簡單的指出幾樣來。第一樣就是執政的人物。現今操縱全國政權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前清的官僚。後進的人物也都是追隨官僚的後塵；他們可以打到官僚界裏去，也就是因為模倣老官僚的緣故。第二樣是執政的思想。歷來大總統的命令和行政官的告示都可以認做現代執政者思想的結晶。他們的思想最高的，不過是孔孟的政治哲學，孔孟的政治哲學是一種『開明政治』的理想，只承認人民是民，不承認人民是人；只承認人民是被治者，不承認人民是能自治的。孔孟的道理即使是能完全實行出來也無足貴，也不能容於民治的時代，何況他們連這個思想還及不上呢？第三樣是政治的制度。民國的總統依然是保存皇帝的儀制，文武百官依然是欺侮百姓剝削小民。火車輪船都是爲官吏謀方便，爲小民生困苦。防瘟疫，剿土匪，都是使官吏發外財，反使小民損失生命財產。借外債，賣礦山，都是肥官吏的私囊，吮人民的膏血。種種專制的毒藥，不可逼數；共和的國家怎麼會有這種制度呢？第四樣是人民。中國

四千年的歷史是專制的歷史。現今的人受了四千年專制觀念的遺傳，一時不能把餘毒除淨。所以人人腦筋還是專制的。他的理想的政治家是拿破崙、袁世凱、最服膺的政治觀念是統一，是武力；最贊美的道德觀念是忠、孝、節、義。上焉者每天的鑽營謀幹，不過是光耀祖宗，掛着一個愛國愛民的假面具。這種人民，因為久伏於專制制度之下，是專能驕下諂上，沒有獨立性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幾千年來所積的惡毒，留到現在，社會學上所謂「*Group Mind*」的。但是他的勢力極大，我們要認清把他一一的除去。本誌歷來攻擊舊思想舊制度的文章並不是好為譏罵，正是這個去毒的意思。因為這舊思想舊制度在舊日專制制度之下，雖然有他相當的價值，但是在民治制度之下，是絕對不能相容的。那些舊思想，舊制度一旦不除，那民治主義也就不能實現於我們四萬萬人民裏。像康有為、辜鴻銘的一派，不承認民治主義，專去辯護尊王，推戴治者也，就擁護歷史傳來的思想制度，却也主張一貫。倘若我

們承認國家是個共和，應該實行共和，那與專制制度關係的思想、制度，都要一齊推翻，絲毫不值顧惜的。現今人民的疾苦，就是這個：國家在名稱上已經變為共和，但是執政的人物，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人物，執政的思想，依然是專制的腦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樣式；一般的人民，也依然不能脫除專制的餘毒，挺然獨出，顯出自己的真生命、真價值來。

現在希望執政者把國家治好，拯救我們小民的苦痛，是等不得，也是萬萬辦不到的。這個有兩個緣故：一則執政者在舞台上所演的戲法已經都演完了。他們不明白民治主義的真意思。名流「民黨」留學生雖然也讀過和文橫文的書籍，他們所記得的也不過是幾個名詞，幾種制度。所以有人要做皇帝，這般新人物就把「民意」端出來；有人要逐總統，就把「國會」造出來。他們怎麼會懂得那些名詞制度所蘊蓄的真精神呢？二則人民專依賴執政者也是與民治主義相背謬。在民治的國家裏，政治是人民的生命，是他最重要

的活動。政治不良，他要監督執政者，推翻執政者。即使政治良，也要鼓勵執政者，指導執政者。所以政治就是人民共同活動的一種表示。共和國家政治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組織的能力若何。共和國家人民生命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的活動若何。但是受專制毒害過深的人民，是沒有政治的生命的。因為他們只知道有命令和服從，缺乏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精神。大家共同組織一個會，人人希望做會長，出風頭；大家共同辦一樁事，人人想掌權，把持一切。大權在握，就頤指氣使，作威作福的，就是專制的腦筋。遇見了位置高，權勢大的，就脅肩諂笑，奴顏婢膝的，就是奴隸的根性。在專制國家內，只有命令者與服從者兩種人，換一句話說，只有專擅與奴隸的兩類。兩種人雖然是相對待，但純然是同一心理，兩種的表現罷了。所以我們有依賴服從的心理，就是我們沒有脫除專制的觀念的一個證據。共和國家內不能容專擅與奴隸的。我們是共和國的人民，不能再等待「執政者」解脫我們了。

我們現在要靠着我們自己救我們了，要靠着我們共同的活動造我們良美的生命了。從今以後，我們每人先把專制的觀念——不特政治上的專制，連思想，風俗，習慣，家庭，各方面的專制也包括在內——推翻，更把奴隸的根性——凡是對於君王，官吏，父兄，思想，風俗，習慣，為盲目的服從，含畏服的心理者都在內——掀倒，纔可以有政治的生命，纔可以聯合組織做共同的組織。有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纔可以稱做民治國家。但是民治國家並不是沒有命令和服從的。不過他的命令不是外來的命令，不是專制的命令，是大家約束大家。他的服從，不是盲目的奴隸的服從，是大家顧全大家的利益，大家顧全大家的生命的一種服從。所以民治國家的總統，不能自己隨意下「上諭」，更不能下講道德說仁義的教條。因為他不過是行政的領袖，他只能在各種法律所定範圍之內盡推行的職務。即在總統政權最大的美國，也是有憲法慣習和他自己的道德觀念管着他。所以民治國家的國會代表不能是「魚行」的夥計，更不能是